

# 香港沦陷的前前后后

## ——忆父亲亲历的抗战悲愤时刻

陈德蓉

抗日战争结束距今已七十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已远离我们的生活，然而战争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依然会引起我们沉重的回顾和反思。1941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就是这样一时刻，它对战局、港人，以及赴港的中国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家父陈修和(1897-1998)，作为国民政府赴港的抗战官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最后在万般劫难中逃出香港，回到了大陆，继续抗战事业。1960年他写下了这段经历，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发表。如今，虽然整整80年过去了，再读他的文章《在香港研究越南问题和看到的英日战争》，回顾事件的前前后后，仍让我觉得惊心动魄，不时扼腕叹息。

父亲于1941年7月从越南西贡抵达香港，之前他在越南开辟中越军火运输线，因为越南陷落，日军侵入，国民政府在越的机构不得不撤退到香港。为了理解而后在港的工作，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在越南的经历。其中的缘由要从1937年“七七事变”说起，当时父亲在国民政府兵工署工作，正在考察如何在中西部分地区，如宝鸡，建立兵工厂，以应对不断升级的军火对抗。“七七事变”当天，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求父亲马上赴越南开辟军火进口的新途径。俞说，中日开战后，上海和广州都保不住，越南海防将是援华武器的主要的进口港口。父亲受命后，当天启程，转道香港，抵达河内。之后的四年里，他奔波于越南及东南亚各国，当时称之为印度支那，多是法国的殖民地。父亲代表兵工署与交通部、海外华人共同努力，在十分危险的环境里，转运了几十万吨的军事物资，对抗初期中国人民独立抗击日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0年9月，法军向日本人投降，日军占领了越南，国民政府的人员不得不撤出。1941年夏，父亲由越南西贡抵达香港，担任军政部香港办事处处长，处理存港物资。当时香港也是国民政府进出口物资的一个基地。随着战局的发展，父亲他们意识到“日寇不能解决中国战事，只有发动太平洋大战，香港自然是要占领的一个据点”。因此父亲决定把存留在香港的物资和人员尽可能地转运到缅甸仰光，由那里再开辟一条通向云南的交通线，他自己也决定在年底前回到重庆，后来的滇缅公路就是这一思路的继续。

需要补充的是，父亲到达香港之后，就发觉英殖民军在港的防御力量同法殖民军在越南的情况一样，“同样脆弱，没有抵抗敌军进攻的准备和决心”，为此他们加强了尽快撤离的行动，但是没有想到，战争的进展比他们预计的还是要快。

与此同时，在父亲抵达香港之后，开始了另一项工作，即撰写一本关于中越历史民族文化的专著。乍听起来，似乎是一件与抗战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实却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在越南，日军与法国贝当政府合作，使越南迅速陷落，中国人大为震惊。其后果不但中断了军火的运输、商业与贸易活动，而且直接威胁到作为抗战根据地的云南，对于整个战局影响很大。此后，大量中国人士撤退到香港。在港，大家纷纷讨论越南问题，认为中越关系的变化应该唤起国人的注意，特别是，抗战中越南人对中、法、日的关系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

当时李石曾正在香港，准备编写一套关于越南的丛书。作为国民党元老，李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持有一种看法：文化不亡，民族就亡不了。他们发现父亲对越南问题已有研究，因为他在驻越南的时间里，工作之余对越南历史和现状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收集了若干史料，且已设法随身带港。父亲说，在越南时，发现越南的风土人情与他的家乡四川有很多相似之处，使他对越南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当时越南尚有大量汉文书籍存在，虽然在沦为法国殖民地后，已被迫放弃汉字，改用拼音文字，这一点也使他十分痛心。在这种情况下，李石曾等人要求父亲写一部关于中越历史民族文化的专著。

虽然父亲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说：“由于大家的鼓励，就鼓起勇气，在办公时间内开始浏览中越和法文书籍，分析中越古代史上的某些问题，动笔书写。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被困，我的草稿才写了一部分，因为材料的来源不易，以后重编的机会很少，虽在敌炮和敌机轰炸之下，仍然没有间断。”他的书《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于1943年在昆明由民族云南大学出版，成为当代研究越南历史的最早专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曾邀请父亲讲授越南古代史，这是题外话了。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当天日军就开始对香港采取行动，父亲等人已不能飞离香港，陷在日军的围城之中，出路渺茫。但是他们感到欣慰的是，美国对日本正式宣战，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形成，父亲说：“我国单独抗

战的局势从此改变，瞻念前途，又觉得乐观了许多。”他在文章中记述了而后形势的发展：“日寇于十二月十三日要求英人投降，香港总督拒绝了。十五日攻占九龙，暂停前进，派员过港说降，港督每次拒绝，战事复起。我面对九龙沿海岸边视察，见各处防务十分松懈，游人往来若织，几乎怀疑这是处在战火圈中。我料定英殖民者必然很快就要投降，但敌军并未猛攻，到十九日才用小艇乘夜渡海，占领香港海边一块基地，陆续进入山岭，用迫击炮和火箭炮向香港中部的商业区盲目射击，而皇后道上可以看到被敌炮击中、横卧道中的中国行人。英殖民当局征集英国全市壮丁应战，我国人民和机关代表请组织志愿军参战，英人不肯发给武器，始终未能实行。英军抵抗极弱，一遇敌人冲锋即行溃退，香港中部的旅馆酒店，时有从前线退回的满身污泥的英国官兵，手持武器，聚饮其中。日军三次派员劝降，港督三次拒绝了。十二月二十五日自来水管被敌炮击毁，饮料断绝，英人乃自行悬挂白旗投降，距战事发动之时，已历十八天了。”对于英日双方的作战态度，父亲批评说：“英殖民军没有准备可以作战的战舰和飞机，仅持少数陆军和要塞来防御，为了保持大英帝国战而后降的面子，而日寇打打谈谈，避免牺牲，也正符合了双方的要求”，换言之，英军对香港的防守，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香港保卫战，没有调动全民的力量实行防御，父亲他们对此十分失望。这与丘吉尔的说法完全一致：“一点胜出的机会都没有”，但他又不可能不战而降，向外界发出负面的讯息，因而只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最终是香港的沦陷，一场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此期间，父亲与同事分散于港岛各处隐蔽，没有发生死伤事故。但是国民政府“交通部驻港办事处的处长和职员多人，在战斗刚要结束的时候，不幸被日寇集体地屠杀了”，父亲以沉痛的口吻记述了这一事件，他们是“为抗战牺

牲的一批英烈，不应被后人遗忘。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开始对中国人实行清算和屠杀，对于滞留在香港的中国各机关的人员，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他们开始寻找各种可能逃脱的途径。其中的一个机会是，日军占领香港以后，发现人口过多，粮食短缺，即宣布在港的中国居民可以疏散还乡。父亲一港利用这个机会，要各机关工作人员和眷属趁此机会，分道离港。他自己则称是梅县客家人，取得归乡证，身穿工人服饰，背上包裹，到渡船码头，准备搭乘去澳头的小火轮，再转赴东江。他们坐在海边码头的地上，与等候上船的几万人一起，足足等待了三天三夜。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军侮辱虐杀中国同胞的罪行，让他终身难以释怀。他曾多次对我们说，日本人看起来彬彬有礼，颇有教养，但是在战争中会变得禽兽不如，其残忍的程度让人发指。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父亲也感到欣慰，但是当他看到日本国旗在北京展览馆升起时，仍有难言之痛。在他的文章中，他直白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日海军布告九龙居民可以渡海过港，而驻守香港码头的陆军则故意阻止登岸，殴打驾船的女船夫和渡客，夺船上所有男女身上的衣服，连同船上的器物，抛在海里，强令这些赤身裸体的男女返回九龙，航至中途，日寇复用步枪瞄准，实弹射击，死伤情况就无法估计了。有一次将登岸的青年男女，剥光衣服，捆到码头空房里，当着几万人面前，任意侮辱吊打，忽有枪声从码头旁边楼房发出，表示抗议。日寇四处搜查，如野兽发狂，逢人殴打，纷乱之中，莫不慷慨自危，在这次事故中，又不知有多少同胞牺牲在日寇的刺刀下面。”

直到1942年1月15日，父亲一行有幸登船启行，日军称这是最后一次遣送。第二天他们抵达澳头，该地日军已经撤退，被中国的游击队占领。父亲说当他们离船登岸时，感觉“如待死囚犯，逃出牢狱，莫不相庆更生”。在他们从

澳头到惠州时，又看到沿途的乡镇村庄，“只要经过日军侵入，均被焚烧过半，瓦砾遍地，疮痍满目”。过惠州时，他们还碰上敌军来袭，好在机智闪过。之后再经数次转道，3月初才抵达重庆，返回原机构。

在这场浩劫中，父亲几乎遗失了他人生的全部珍贵资料：留法兵工学校的讲义，个人早年和留法期间的手稿、照片，以及有关越南的很多资料，只带出了撰写越南历史的手稿。他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晚年时，常常告诫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各种难题，而不要依靠战争和武力。

2021年11月于九龙嘉道理道

### 陈修和(1897-1998)生平简介

原籍四川乐至。早年毕业于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立志工业救国。大革命时期，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毕业于第五期炮兵科，参加北伐战争，任蒋介石侍从副官。之后被派到上海兵工厂工作，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的兵工行业提出诸多建议。1932年赴法国学习，1936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兵工学校。回国后即投入为开辟和保障抗战军火运输线的工作，1937年至1941年奔走于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及香港各地，任军政部兵工署驻越南、香港办事处处长。香港失陷后，回到内地，任中美联勤司令部军械处处长，继续抗战事业。1945年抗战胜利时，代表陆军总部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帮助胡志明实现民族独立。1946年内战开始，任沈阳兵工厂总厂长。在辽沈战役中，因拒绝炸毁兵工厂和转移员工，脱离了国民党系统。1949年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参事，为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大方案，如成渝铁路、长江三峡和南水北调等工程。一生中也曾著书立说，撰写了《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等专著，并写了大量的回忆录。

# 笔会

记录

### 石南桥畔第三株

(国画)

马锋辉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 难忘余山岛

李挺松

了官兵的餐桌，为全体官兵营建了一个温暖的家园。你对我说，其实你也是很想家，想远方的父母，想妻儿平日团圆，但是，你心里实在撇不下这个连队，撇不下这个东西长五百米、南北宽两百米的小岛——虽然它的面积只有约0.037平方公里，最高海拔63.5米，但是它是上海唯一的中国领海基点所在地。

还有那位指导员的妻子，你们母子现在平安吗？因为指导员工作忙，不能如期回家探亲，你便拖着8个月的身孕，从老家沈阳千里迢迢，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奔波来到了吴淞军港，第二天一早

又乘坐补给船，经过五个小时海上颠簸，终于到了余山小岛，在指导员的搀扶下走完了247级台阶。彼时彼刻，我十分庆幸我们的指导员能够娶到你这样美丽的妻子。就在当天晚上，你在我们连队最简陋的门诊室里，早产生了，我们的指导员心疼你，紧紧地抱着你失声痛哭，而你却强打着精神微笑安慰他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提前团圆了。在海岛实习的岁月里，我心里时常在想，能够嫁给海岛雷达兵的女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善良、最美丽、最可爱的女人，你们是军人背后的力量源泉，中国海防的强大离不开你们。

《优雅老去》，是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的作品，日文版原名是《熟年革命》。我随意翻译，除了缘由与渡边先生的私交甚笃，最主要是因为父亲。

父亲是三年前去世的，享年九十五。为他操办葬礼，我是有想法的。总觉得殡仪公司代办的全套公式化服务，不足以表达我的哀思。“思极深而不晦，情至哀而不伤。”父亲都活到九十五了，还需要沉痛哀悼吗？更何况，父亲一生，乐观通透、看淡生死，并且生前早有交代。他的事，我清楚。

父亲吴宜寿，到底是怎样从泰兴老家考上苏州中学后进厦门大学再来复旦大学任教的，我不清楚。只记得小时候跟着他身后躲进教研组偷看动物标本、初识人体经络穴位的“生死”经历。当时，我只是好奇浸泡在瓶里完美无缺的生命标本，根本不可能明白父亲心中的生命标准。我也不清楚父亲在学术上到底有多大建树，获得多少科研成果。只知道他一手好字，授课写在黑板上的粉板板书，工工整整一字不改，以至于值日生都不舍得擦黑板，学生好评如潮。古文功底又好，身在生物系却深得中文系大教授朱东润的赏识。最让我从小耳濡目染感受深刻的，并不是父亲的书本教养，而是父亲的行为修养。直观地讲，就是：乐观！回想小时候，父母拉扯着我的三个姐姐和我，一家六口的日子，并不宽裕。我的裤子，还有一条从大姐二姐三姐接力穿下来，再两边缝合中间开裆，拿来就穿。每年除夕年夜饭，父亲的拿手菜是粉蒸肉。绝活拿手戏，是笛子和二胡，一人吹拉弹唱。在那个沉闷单调的年代，父亲，像一根苦瓜，吃苦自知。但一旦投入到别人的汤里，总能甜了人家。乐观，是优雅的原型和底色。

我四岁和五岁那年，发生了两件事，说来都很不乐观。但偏偏就这两件事，却让我终身难忘，甚至影响和决定了我的一生。

(一)“天大的事”

四岁那年，父亲命我练毛笔。某日，我在临窗的书桌上埋头苦练。忽闻楼下女孩的嬉笑声，寻声望去，只见窗外随风飘舞着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泡，在夕阳的照射下，绚丽多彩，煞是好看。秉性贪玩的我，爬上书桌，飞身抓去……跳楼！救命车呼啸而来，情况不容乐观。幸好，家在二楼，加之雨过天晴，烂泥地滑，跳下并无大碍。发了高烧，绑个石膏，没几天出院回家了。如果楼下有石头？如果是头着地？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满以为父亲会被跳楼的“天大的事”，搞得失去方寸乱了手脚，我也可趁机有“恃”无恐地不用练字。“手没坏，继续练。脚，穿这个。”父亲递来一双新买的护脚跟高帮鞋。什么便宜也没捞到的我，得到最多的，就是左邻右舍大叔大妈的一句廉价“创可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父亲，却把“坏事变好事，才算真本事！”的话，天天挂在嘴上。

(二)“屁大的事”

五岁那年，从复旦中心村搬到了国权路上的第四宿舍。父亲的好人缘，还缘于他的“江湖地位”——一手好金针。谙熟人体经络、脉搏穴位的他，教学之余，自学针灸。只要有人来敲门，必放下碗筷，拎起针灸包，就走。什么头疼脑热伤风感冒拉肚子开胃口的“疑难杂症”，父亲总能针到病除。我总爱紧随其后，当“跟屁虫”。住在我家前一排的邻居大妈，动完手术后，肚子胀得难过，情况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通气不得。这“屁事”，父亲也能管？！只见父亲进屋，望闻切问；我只好等在门外，望闻屁声……不一会儿工夫，就传来大妈一声长叹“啊呀，舒服啦~”，哈哈的笑声，似笑非笑的，上气不接下气……“屁大的事”，化作欢天喜地的头等大事。

两年两件事，无形中成了父亲给我的“学龄前教育”。拥有“没有体育的教育，等于绝育”理念的父亲，为了锻炼我的双脚，六岁时，又起劲叫我练乒乓。也许“跳楼”导致的后遗症所致，儿时的我，愚钝木讷，发育迟缓。功课体育双差生的我，总算在复旦二年级时，“发育了！”——勇夺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的男双冠军。而且决赛局，是在15比20落后情况下，连扳7分，反败为胜拿下的。是否应验“大难不死”，不得而知。但一次夺冠，父亲的乐观思想，竟鬼使神差地移植进了我的大脑。于是乎，再“天大的事”，我也能泰然应对；

# 为了「优雅老去」

吴四海

再“屁大的事”，我也不会草然应付。

二十年前母亲去世后，我就把父亲接来同住。记得那天，父亲把两张银行卡、两本存折，还有一个写有取款密码的信封，往我面前一摊，说，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和你在一起，才有意义，拿去吧！父亲的乐观生活，一如既往，一尘不染。每天，定时起床撒尿，吃饭吃药，散步报报，泡脚睡觉——生活规律，特立独行。非但没有给我们三口小家带来任何麻烦和不便，反倒增添了无穷乐趣和色彩。父亲的自理自律自爱、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的“三自乐”，也成了我和太太以及女儿吴限好的座右铭。

葬礼，既是对死者的人生总结，更是与逝者的一次心灵对话。乐观葬礼，何乐不为？！卸下悼念大厅“沉痛哀悼，永垂千古”的标语，换上满墙的青青绿草，中间用白色康乃馨围成一颗心，嵌进一张父亲的遗像。那是我在家每次替他理发后，习惯拍一张的手机照。很精神，抿嘴一笑。厅内前排，打破常规，特意安排了白色布套的座椅，供年长者休息。厅内音乐，不再是催人泪下的哀乐，循环播放的是大提琴曲《殇》。那也是我偶尔听到，当时就泪流满面，收藏在手机里备用的……大堂布置，我策划。大殓仪式，我主持。自导自演的喜葬，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要让“一生苦瓜”的父亲，走好最后一程，转苦变甜。让他在孙女吴限好长笛吹奏的勃拉姆斯《摇篮曲》中，永远地甜美睡去……喜葬，我让殡仪馆的追悼大厅，第一次响起了笑声和掌声。前所未有的格调，也为殡仪公司带去了新的经营理念。据悉，那以后，凡是准备筹办年过九十逝者的葬礼，殡仪公司都会放录像向向其家属推荐我的“四海模式”，当然我不收版权费。“父子同心，其利断金”，父亲若是在九泉之下感知自己还在助人为乐做好事，该有多高兴啊！

任何情感，默契比热情重要。所有优雅，没有乐观，全是装饰。“天大的事”，不怕；“屁大的事”，做大。回首往事，一人创办了二十年的全国首播日语节目《中日之桥》，一人赴日制作一档新年《亚洲风》实况转播的“日本特辑”，还有2020年一人策划主持采访的八集系列纪录片《论语与算盘》的所谓“大事”，现在看来，都已成“屁事”。当下，成就自己，实现“才算真本事”的父亲遗愿，才是大事。小楷，抄完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争取七十岁化名吴羲之；小球，今年获得了上海市业余最高水准“红双喜杯赛”的第四名，力争八十岁拿下世界元老赛的乒乓冠军！父亲与我，乐观对视；父子同下，成就彼此；下岛，他说服了营领导，多次主动放下岛到城市部队工作的机会，自觉在海岛默默奉献。有人说他傻，但他却自豪地说，余山岛环境艰苦，我作为党员理应带头吃苦，我们站远离大陆，可我的党员标准不能丢。

在边防小岛实习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如今，我已经回到繁华的大都市工作。此刻的你们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驻守在海岛上，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但是，有过军队经历的人都知道，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和你们——我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用我对本职工作的尽责奉献，来回应那些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那些不可磨灭的记忆。

一样尽心尽责地坚守在本职岗位上……我们岛上的所需物品完全靠大陆补给，遇上大风补给船无法靠岸，只能吃库存的海带、粉丝、土豆等食品；有时补给船开到了码头却无法靠岸，只好挥泪而别；有时一班航船能收到家中的八九封信，家里遇到急事更是无法处理，家属随军后也无法来队……报务班长李建国家属两次上岛后流产，营里安排他下岛到城市部队工作的机会，自觉在海岛默默奉献。有人说他傻，但他却自豪地说，余山岛环境艰苦，我作为党员理应带头吃苦，我们站远离大陆，可我的党员标准不能丢。

在边防小岛实习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如今，我已经回到繁华的大都市工作。此刻的你们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驻守在海岛上，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但是，有过军队经历的人都知道，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和你们——我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用我对本职工作的尽责奉献，来回应那些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那些不可磨灭的记忆。